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嬗变的幻象与本质

姜英华, 马芳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 从机器大工业时代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无产阶级历经了从产业工人到数字工人、从绝对贫穷到相对贫困、从数国聚集到全球布展的嬗变历程。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 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导致无产阶级呈现出数量规模上消散瓦解、存在方式上自由轻松、福利保障上整体增益、革命意识上削弱淡化的幻象表征, 进而在思想意识与现实运动层面挑战和消解了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时代在场。为廓清无产阶级的时代在场, 需穿透幻象表征看到背后真相,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握无产阶级的主体概念, 洞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本质, 拨开数字劳动隐性剥削的迷雾, 探析数字资本食利狂欢的范式, 审视阶级斗争出场面向的现状。由此, 可以明晰无产阶级仍然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且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困阶级, 其作为革命主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未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以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理论仍具有强大科学性和阐释力。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 数字工人; 数字劳动

中图分类号: A81; D0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6) 04-0209-09

On the illusion and essence of the proletaria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JIANG Yinghua, MA Fang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era of large-scale machine industry to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proletariat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industrial workers to digital workers,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relative poverty, and from concentration in several countries to global distribu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collusion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has led to the illusion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characterized by its apparent disintegration and disappearance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scale, a seemingly free and relaxed existence, an overall increase in welfare benefits, and a weakening and dissipation of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This has challenged and undermined the presence of the proletariat as a revolutionary subjec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o clarify the presence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current era, it is necessary to penetrate through the illusionary representations to see the underlying truth. We should grasp the concept of the proletariat as a subject through the class analysis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who own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dispel the fog of hidden exploitation in digital labor, analyze the paradigm of the profit-seeking frenzy of digital capital, and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earance of class struggle. It is clear that the proletariat remains a class that does not ow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has to sell its labor to survive. As a revolutionary subject, the proletariat has not vanished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theory of its revolutionary subject status proposed by Marx and Engels still possess strong scientific valid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proletariat; digital workers; digital labor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对无产阶级的劳动方式及存在形态进行了重塑。无产阶级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在技术迭代对资本统治的赋能作用下趋于隐匿,其革命主体地位亦在当代阶级结构的构型中面临挑战。基于此背景,西方左翼学者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消失论”广泛传播且影响较大。一方面,部分学者直接对无产阶级的存在性提出质疑。Gorz^[1]较早提出“工人阶级消亡论”,他指出,伴随信息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改善,无产阶级的消亡成为客观事实;柯亨^[2]通过对马克思所界定的无产阶级内在规定的审视,认为当下已不存在集“多数”“生产”“剥削”“贫困”“无所可失”以及“革命”等特征于一体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重构当今时代的革命主体来否定无产阶级在当下时代的存在。哈特等^[3]从非物质劳动的视角出发,认为“诸众”是当前唯一具备革命能力的主体;迪尔-维斯福特^[4]则聚焦数智算法催生的控制论,将无产阶级的范畴延伸至“赛博无产阶级”;阿甘本^[5]、Badiou^[6]、Dean^[7]等人也分别提出“神圣人”“游牧无产阶级”“符号群众”等反抗主体。这些新的革命主体能否承担起马克思所赋予的推翻资本主义的使命?无产阶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是否真的发生蜕变并丧失其存在的根基,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国内学者主要从无产阶级的概念阐述以及新革命主体范式维度展开分析。在概念阐述方面,林锋等^[8]通过精准把握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无产阶级,延伸了当代无产阶级的适用领域和群体;李素琴^[9]沿着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脉络,从文本学角度梳理无产阶级概念的嬗变;赵子晨等^[10]基于“典型分析法”从无产阶级概念中衍生出数字无产阶级这一描述性概念,并对其内涵、一般规定、共同特征进行界定。在新革命主体范式回应方面,蓝江^[11]通过对数字劳动、数字生产方式的本质分析,认为“流众”本质上是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市场相互渗透的结果,不足以承担数字无产阶级的使命;程恩富等^[12]认为“诸众”只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折射出资本主义智能经济中人的普遍处境,无产阶级不会被“大众”取代;巩永丹^[13]对“认知无产阶级”“用户无产阶级”“被分离的人”“赛博无产阶级”进行

多维分析,强调这些革命主体同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有一定距离。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无产阶级”概念的时代性阐释以及对新主体理论范式的回应,在无产阶级嬗变表征方面,特别是从正反两个维度对其开展双向辩证考察,仍存在深入探究的空间。基于此,本文首先对无产阶级的嬗变历程进行纵向梳理,接着从横向层面描述无产阶级在嬗变历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系列幻象表征,然后基于“无产阶级”概念的核心内涵对幻象表征展开本质剖析,最后辩证揭示无产阶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然在在场的事实,从而有力回应有关无产阶级消失的片面观点。

一、无产阶级的嬗变历程

当平台、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资本积累进程时,资本主义持续获取与其相适配的生产方式,从而得以将资本的“普照之光”从机器大工业时代延展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统摄着内生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线”无产阶级的生产与生活。不可否认,“在线”的无产阶级赓续了马克思所处时代“在场”的无产阶级的内在规定性,但在生产主体、生存境况、分布格局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并获得了新表征。无产阶级历经了从产业工人到数字工人^①、从绝对贫困到相对改善、从数国聚集到全球布展的嬗变历程。

(一)生产主体:从产业工人到数字工人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4]520}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劳动以分工为基础,呈现出固定化、职能化的手工

① 数字工人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产业工人相对应,文中的数字工人被限定在生产主体这一范畴内,指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群体。马克思指出:“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因此,数字工人的前提条件是雇佣工人,其次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两者缺一不可。基于上述概念,本文认为,数字工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数字技术开发软件、设计制造硬件、收集和加工数字信息产品的专业雇佣劳动者(如程序员、技术员、技术工人等);另一类是基于数字平台开展数字劳动的零工劳动者(如快递员、外卖员、网约工等)。

劳作特征。故而,工场手工业工人可被界定为局部工人。从自然属性以及身体器官的限制来看,局部工人无法独立完成完整商品的生产,仅能凭借自身的局部劳动,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部分参与协作。因此,这一时期的生产机构表现为一个以局部工人为有机组成单元的“人为”生产组织。机械工具的发明以及蒸汽机的应用,促使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迈入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进程中,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工场演变为工厂,原本分散的手工劳动借助机器体系实现联结,进而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模式,局部工人亦转型为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不再作为“活机构的肢体”即“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而是“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4]486}。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14]489}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生产系统逐渐代替机器大工业时期的一般机器生产系统,工人无需被固定在工厂和机器旁从事传统劳动,更多的是借助电脑、手机等数字终端展开数字劳动。在数字劳动过程中,虽然传统的物质生产资料让位于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生产资料,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企业及其员工、客户和资本家关系的核心”^[15],生产主体也逐渐从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转变为数字生产中的数字工人。但是,数字工人所从事的数字劳动,其实质是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由数字资本开发并占有的数字技术,对数据实施加工改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平台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载体,算法以自由、自愿、分散无中心的规训模式,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隐性剥削。数字工人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主体,在数字劳动中仍遭受数字资本全方位、深层次的操控与剥夺。

(二)生存境况:从绝对贫困到相对改善

无产阶级呈现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样态相融合的特征,“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是无产阶级生存状况在“质”的层面的内在规定性,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然而,在考察无产阶级的纵向演变历程时,需立足实际,关注无产阶级生活境遇在“量”上的动态变化。恩格斯曾考察机器大工业时代无产阶级绝对贫穷的生存境况,指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

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烂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16]537}

相较于机器大工业时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价值增殖的效率显著提升,无产阶级可掌握的生活资料亦相对增多,其生活状况随着生产力的绝对进步而有所改善。在经济层面,资本家通过提高薪资水平以及创设大量低门槛的就业平台,如电商平台、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岗位,供无产阶级按需承接以获取收入。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为无产阶级开辟金融获利渠道,通过提供各类信贷服务(如P2P贷款)、租赁经济模式(如Zipcar汽车租赁)来满足无产阶级生产生活的经济利益需求,进而促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从类似贫民的困境提升至现代化水准。在政治层面,资产阶级通过拓展民主范畴、健全议会民主制度、完善民主设施等途径,将无产阶级纳入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体系,使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表达自身政治诉求和参与选举的权利。据相关数据表明,头部网络公司近年来强势涉足政治领域,“包括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在内的美国网络公司在政策参议方面的投入已经从2010年的1600万美元暴涨至2020年的6300万美元”^[17],各类平台正在为个人提供更多发表意见的机会。在社会保障方面,资产阶级以数字化包装方式将其财富渗透至无产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运用经济、行政、法律、保险等手段为无产阶级打造即时配送、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数字舒适区”。无产阶级的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贫困”,而是与资产阶级和社会进步相比的“相对贫困”,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统一。

(三)分布格局:从数国聚集到全球布展

无产阶级的分布格局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态势相伴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英国、法国等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前沿区域,与之相应,无产阶级在资本的支配下率先在这些国家集聚。由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8]35},“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

界”^{[19]566}，由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日益发展壮大，分布于世界市场的现实版图中。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世界市场尚未达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能够自由跨越国界的程度，因此，当时无产阶级的全球布局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高级网络系统日渐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20]54}，数字资本主义“可以充分利用那些曾经限制其发展的政治地理因素突然消失之后出现的无限商机”^{[20]280}，使得无产阶级的全球布展与资本的全球扩张深度交织。首先，从无产阶级的全球存在形式来看，数字经济正在催生一批新型劳动力大军，数字劳动者群体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被大型科技公司雇佣的程序员、产品经理等数字技术精英，他们作为数字经济的“编码高手”居于不可见的数字生产层；另一类是存在于可见的数字终端执行层的自由职业者、众包微工和网络零工。这些数字劳动者都处于数字资本的全球统治中。其次，从无产阶级的全球空间分布来看，全球无产阶级正在网络空间壮大并且形成了与数字资本流动相匹配的等级结构，在数字资本最集中的金融中心和科技公司一端聚集的是工人贵族，而在全球南方的“血汗工厂”里存在着大量直接或间接为平台算法系统开发制造数据、处理电子垃圾的数字劳动者。最后，从无产阶级的全球劳作关系来看，数字平台虽将不同层级、不同空间的数字劳动者分割为独立的、个体化的原子，但全球无产阶级通过数字网络被前所未有地协同在数据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弹性化的全球流动已成为一个经验性的事实。

二、无产阶级在嬗变历程中呈现的幻象

纵观无产阶级自机器大工业时代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演变历程，毋庸置疑，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14]699}这一情境下，无产阶级的现实存在呈现出新的样态。然而，此种样态在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互勾结的掩盖下，遮蔽了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致使无产阶级在数量规模、存在方式、福利保障、革命意识等维度展现出一系列虚幻表象。

(一)数量规模消散瓦解

无产阶级在传统产业升级与数字经济纵深发展的双向互动进程中，呈现出零散化、边缘化态势，数字经济造成了无产阶级在数量规模层面消散瓦解的假象。其一，基于“一般数据”的数字生产方式使个性化生产成为现实。当生产性劳动跨越工厂

边界与互联网平台实现对接时，无产阶级无需再集中于工厂的厂房或机器旁，但凡能够连接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的场所，均可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工作场地，零散且广泛分布的网络空间生产取代了传统的集中规模化工厂生产。其二，伴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与更新迭代，从替代体力劳动的自动化机械设备，到当下数字技术所具备的“类人”智慧，众多低端劳动岗位被智能机器所替代，如扫描支付程序替代了超市收银员岗位、无人驾驶技术替代了专业司机岗位。“生成式 AI 技术加持的智能工具日益展现出强大的认知劳动能力，会写作、能绘图、擅编码、精翻译……不可避免地会对在线接活的自雇者产生就业替代冲击”^[21]，大模型技术的渗透应用使无产阶级面临失业或职业转型的难题。其三，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分层机制加剧了无产阶级内部的结构分化。部分无产阶级群体通过接受教育、技能培训、积累智能资本等途径进入技术密集型岗位，并在收入层面跻身中等收入群体，无产阶级似乎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反抗的革命主体也就近乎瓦解了”^[22]。

(二)存在方式自由轻松

数字技术于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应用，遮蔽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促使数字资本在其隐匿的话语体系中构建出一个“平等自由”的虚拟场域，从而营造出无产阶级于数字场域中享有自由且轻松状态的虚幻表象。一方面，这种自由体现在劳作过程中的灵活、多元。数字资本主义消解了无产阶级因物理空间受限的劳动自由，无产阶级“不再因为工厂制度的刚性、直接绩效的量化、工作时空的限定成为个体自由的樊篱”^[23]，而是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参与到何种工作中去。例如，平台从业者（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能够自主调节每日“上线”与“下线”的时间，并根据自身的生活节律和劳动负荷水平动态调整“接单数量”。该群体的劳动形态和劳动方式可以阐释为具有选择的自主性、时间的灵活性以及空间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体现在“他者消失”的全景敞视中。数字平台基于数据仪表盘不可见性，营造出“无监视”的假象，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除了数字化仪表和平台辅助，劳动过程察觉不到任何监视和强制”^[24]，这种新型规训机制与传统的训诫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换言之，无产阶级的生产与生活看似已脱离资本家的直接掌控，无产阶级能够在自由的劳动场景与生活的享乐场域

中满足自身的内在需求。此外,与这种权力统治模式相互契合的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剥削”,即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剥削披上了自由、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外衣。这里并没有强迫我劳动、使我发生异化的剥削者。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剥削着我自己。”^[25]

(三)福利保障整体增益

资产阶级惯于将“私人利益”粉饰为“公众福祉”,通过调整工资水平、提升福利待遇、完善收入机制等手段,精心勾勒出无产阶级的福利蓝图。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及生育等领域所享有的普惠性福利,成功遮蔽了福利资本的本质,进而营造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进程中“共享”成果的假象,仿佛无产阶级也搭乘上了资本积累的“札格纳特车轮”。这一幻象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更为显著的特征,零工经济已成为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灵活就业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大范围地拓宽了数字工人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机会。“技能劳动者会是鱼与熊掌兼得的大赢家。他们的技能优势让他们可以拿到高薪,并享有最好的机会去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活,创造自己的未来。”^{[26]8}以苹果公司资深程序员为典型案例,此类数字劳动者凭借其专业技能,借助“技能溢价”机制,可获取远高于同行的固定薪资。“对于从事传统意义上‘劣质工作’的低技能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为其提供了将劣质工作转化为相对优质工作的可能性。”^{[26]12}平台依托算法匹配系统,将零散的劳动需求与低技能劳动者进行精准匹配,使其在“按单计费、多劳多得”的激励模式下实现收入增长。以外卖配送员为例,其收入由基础配送费用、高峰时段补贴、客户评价奖励等多项算法参数构成。这种基于算法的动态报酬与激励体系,即“基本报酬+奖励+小费”的收入模式,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与不稳定性,而且外卖配送员要实现三部分叠加的全部收入更是困难重重。因此,增量收入对于他们而言,宛如撒在苦涩糕点表面的糖霜。从表象上看,这种普遍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似乎是一种实现劳资双方共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实则巧妙地掩盖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生活状况与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这一客观事实。

(四)革命意识削弱淡化

从理论层面审视,革命意识的削弱淡化体现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新政治主体”对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的解构。Gorz^[1]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转型,指出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已难以囊括当代劳动者的异质性特征,“非工人阶级”遂取而代之;

哈特等^[3]所提出的“诸众”,是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背景下对革命主体展开的全新思考,他们认为“诸众”能够在以知识、语言、代码、信息为表征的“人造的”共同性之中,借助协作交流培育出组织自身的革命力量;Žižek^[27]更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主体性困境作出激进回应,通过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重构,将被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结构性排除的“被排斥者”视作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新无产阶级”概念,在理论构建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去革命化”趋向。此理论范式与马克思所定义的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存在着根本性差异,然而,它却成为当下流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接受的非工人阶级概念。从现实层面考量,数字平台借助智能算法构筑“信息茧房”,将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锁定于普惠性、个性化、便捷性的福利资本与服务消费领域,致使无产阶级沉溺于即时可得物质利益,其革命意识似在“数字享乐”进程中呈现出弱化趋向。此外,依托“我在线,故我在”的数字社会架构,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被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并暴露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照光”之下。数字技术不再以纯粹中立的技术形态存在,而是内化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平台经济中的“用户画像”“行为标签”等技术手段,将劳动者的消费习惯、社交网络、位置轨迹等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规训指标,进一步降低了无产阶级对资本剥削的判断能力,致使其革命意识在技术理性的主导下呈现消解态势。

三、无产阶级在嬗变历程中呈现的幻象的本质

无产阶级在演变进程中所呈现的假象是否预示着无产阶级的真正消逝?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回溯至无产阶级的概念原点。恩格斯曾于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注释中明确界定:“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18]31}此后列宁在论述“阶级”这一概念时也道出了无产阶级的本质规定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8]从生产

的前置条件来看,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在劳动进程中,无产阶级唯有出卖自身劳动力,方可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后,凭借出卖劳动力重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而开展生产与劳动。故而,在劳动成果与财富的分配环节,无产阶级既属于被支配与被监督的客体,也是无法获取和享有劳动果实的被动主体。无产阶级是受压迫最深、一无所有的被剥削主体,“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19]262},始终承担着推翻资本主义进而解放自身的使命任务。基于此,唯有从无产阶级的概念与本质着手,结合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最新表征,以辩证视角进行审视与批判,方可透过错综复杂的表象洞察背后的实质。

(一)洞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本质:“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

“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14]216} 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中“产”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劳动生产中运用的生产资料,并非生活资料。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资料的形式发生显著变化,机器、厂房等传统的生产资料逐渐被数据、平台等数字生产资料所取代。数据商品因其天然具有垄断性特征,被资本家更为集中地占有。根据 Statista 的数据,谷歌和脸书两大巨头通过占有大量消费行为的数据,2023 年广告业务收入超过 2000 亿美元,占据数字广告行业的份额达到 57%^[29]。数字平台作为数字资本运行的重要载体,由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支撑,以谷歌、脸书、Twitter、TikTok、亚马逊为例,这些数字平台被少数科技寡头和资本集团高度垄断。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分散在各个数字终端使用这些数字生产资料,并非源于他们对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的实质占有,而是因为数字资本通过平台化机制建构的特殊生产形式。具体而言,数字平台以数字租赁权代替传统生产资料所有权,通过用户协议或数字契约的方式将劳动者绑定为数字劳工,在数字劳工展开数字劳动的过程中,算法规训作为“电子皮鞭”实时追踪监控他们的劳动过程(如在线时长、服务评分)。在这种“无占有而参与”的表象下,劳动者看似可以自主地生产和流通平台提供的免费信息,实则深陷算法控制与数据剥削的隐性规训网络。由此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并未改变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这一本质,那么无产阶级的消失瓦解也就无从谈及。

针对因数字技术替代效应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消失论与无用论观点,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明确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14]742} 当下,因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应用而产生的过剩劳动人口,与产业后备军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在马克思那里,流动的、潜在的、停滞的产业后备军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现役劳动军“二者都同属于无产阶级”^[30],这些产业后备军并非被资本摒弃而毫无价值。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资本家得以借助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产业后备军从“无价值个体”转变为类似现役劳动军的“有价值个体”,进而保障劳动的供求规律契合资本增殖的需求。由此可见,过剩的劳动人口依旧绝对地从属于资本,肩负着资产阶级“掘墓人”的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均持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即一端是资本家,另一端是雇佣工人。相较于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会产生更多且规模更大的资本家以及更多的雇佣工人。“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14]709}

(二)拨开数字劳动隐性剥削的迷雾:“无产阶级不得不出卖劳动力”

无产阶级于劳资关系中所呈现出的自由、轻松表象,需穿透数字劳动隐性剥削的迷雾,方能明确无产阶级“除了借由工作不断创造条件让别人主宰自己外,他们别无可为。这就是资本统治下的劳动者的自由”^[31]。

从劳动过程看,“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控制形态的变化,表现为数字化生产资料和数字劳动者的短暂结合的形式上的变化,其雇佣劳动的本质并未改变。”^[32] 无产阶级表面上享有参与数字劳动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地在平台上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合法的自由人。实质上,他们是被剥夺了数字生产资料“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一旦被吸纳进数字生产体系,就再也没有议价能力和替代选择,只能以“被迫同意”的方式展开数字劳动以换取最低限度的薪资。也即,工人“在形式上被设定为‘人格’,他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本身还是某种东西,他只是把他的生命表现当作他自己谋生的手段来让渡”^{[33]249}。这揭示了无产阶级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出卖自身劳动力

的自由,实则为“被剥削”的自由。此外,在数字劳动进程中,无产阶级的自由与数字资本权力构建的生产桎梏相互对立。数字资本借助平台契约、算法控制等手段,实现对无产阶级劳动过程的全面掌控。整个无产阶级在资本家的数字监管下开展劳动,其所生产的数据被资本家占有。

从劳动方式看,自由轻松的背后是“全天候”在场。不可否认,数字劳动在提高无产阶级用工自由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但也要承认数字平台在资本家的拿手好戏下被资本化的事实。其一,“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14]281},数字平台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反而通过算法派单将劳动时间碎片化,使无产阶级陷入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的紧迫悖论中无法抽身。例如,外卖骑手为维持“优先派单权”通常会主动延长在线时长,为避免“超时罚款”以连轴转的方式开展接单服务。其二,数字平台作为“全景监狱”的技术集成形态,对劳动过程实施监视与控制。无产阶级表面上似乎具备了脱离资本掌控的能动力量,实则深陷由“准时率、差评率、接单量”等数字指标所构建的隐性评价体系。平台借助数据追踪达成对劳动过程的精准调控,从而实现维护劳动秩序与攫取剩余价值的双重目标。其三,无产阶级的“自我剥削”并不意味着剥削侵害的消除。相反,“自我剥削”是在“内卷”竞争与超负荷劳动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不得不”的现实约束和“你能够”的潜能激发,构建起劳动者自我完善与自我剥削相互强化的循环机制。无产阶级于平台之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条评价、每一段移动轨迹,均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产,供资本家占有。

(三)探析数字资本食利狂欢的范式:“无产阶级处于贫困地位”

无产阶级能否在资产阶级所构建的福利图景中实现富裕?答案是否定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关系的基础依旧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它就预先假定了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划分”^[34],也就是说,呈现出的一极是所有者财富的累积,另一极则是生产者贫困的累积之态势。

一方面,从福利资本的表象来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福利资本看似将社会的总体财富涓滴转移至无产阶级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14]714}。实际上,资本家“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16]380}。“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

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4]714}可见,这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巧于粉饰献媚的福利保障仅仅是为了“工人在年老或生病、发生危机等情况下,不会成为贫民院、国家的负担,或者行乞(一句话,负担要落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而决不要落在资本家身上……)”^{[35]146},其结果将是工人维持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水平。

另一方面,从资本积累的本质范式层面审视,数字资本作为技术层面更为成熟的资本新形态,虽外在形式有所改变,但其本质未发生变化,依旧遵循生产剩余价值或获取利润的普遍规律,且具备绝对的逐利性。一切价值均源自劳动,但在数字资本的支配下,无产阶级的劳动最终呈现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33]251},这即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工资收入的增长相较于数字资本积累的速率以及资本家所获取的财富而言,呈现出相对少的特征。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全球收入的52%,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只赚取了全球收入的8%。处于全球收入前10%的人每年的平均收入为87,200欧元,而全球收入后50%的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则为2,800欧元。前1%的人获得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财富增长的38%,而底层50%的人只拿走了2%。”^[36]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在数字资本作为主体食利狂欢的饕餮盛宴中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富裕,他们依旧在资本不可逆转的积累过程中作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主体而存在。

(四)审视阶级斗争出场面临的现状:“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资本的生产方式愈发伪善地塑造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弱化的假象,以此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构成挑战。显然,意识弱化并不等同于“缺席”,并且仅依据无产阶级外围性的意识弱化来否定其革命性内核,存在简单化处理的风险。因此,需在明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前提基础上,结合阶级斗争的新态势来确证无产阶级的持续存在。

首先,以资本与劳动为核心构建的阶级关系,构

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石。无产阶级作为大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体,根源在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面临着双重处境:一方面,无产阶级深深嵌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与最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紧密关联且难以分割;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得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取维持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正因如此,无产阶级唯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废除现有的全部占有方式和统治关系,从而实现自身的解放。在这一解放的前提条件下,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是指肩负“资产阶级掘墓人”使命的“自为无产阶级”,而非仅仅局限于在经济领域开展斗争的“自在无产阶级”。基于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正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矛盾,才赋予无产阶级以革命主体的身份。这一身份的确立,源于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结构性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最终指向其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然而,西方学者运用“新政治主体”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展开的理论解构尝试,实际上未能触及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核。Gorz^[1]以“非工人阶级”取代马克思所界定的无产阶级,表面上对数字劳动者异质性的新特征作出了回应,然而却忽略了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已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环节这一关键事实。哈特和奈格里所提出的“诸众”概念,将革命主体从生产关系中的被剥削阶级转换为生命政治生产中的协作主体,此种转换本质上消解了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物质根基^[3]。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依赖于客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并非仅仅基于纯粹的主观意愿联合。Žižek^[27]提出的“被排斥者”强调边缘群体通过抵抗排斥自身的体系以实现自我解放,但无产阶级的解放唯有通过废除私有制才能达成,“被排斥者”这一革命主体实际上回避了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诉求。由此,“新政治主体”尚无法充当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在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关系的进程中依然存在。

其次,正确审视资本运动规律下无产阶级的解放潜力,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实践的可能性。数字技术在借助算法控制、平台吸纳等手段加剧无产阶级劳动异化的同时,也使全球无产阶级能够了解彼此的工作状况与斗争情形,从而为无产阶级认识自身的悲惨境遇以及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斗争提供现实依据。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虽然这一

切在现有基础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19]55} 与此同时,“洪水期到来”之前的征兆显示,“一旦罩在资本上的面纱被撕开,资本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很容易就能看出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如何去做。”^[37] 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拉丁美洲的“粉红浪潮”运动、法国巴黎的“黄背心”运动以及全球各地爆发的各类抗议运动与反紧缩运动,这些具有激进变革性质的社会运动虽尚未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但阶级斗争的潜力蕴含其中且广泛存在。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在“革命性的变革并非瞬间完成,亦非在某一特定阶段发生,而是一个历经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漫长进程”^{[35]284} 中始终存在。

四、结 语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从事劳动的范围从机器工厂延伸至网络空间,数字技术像一束“救赎”之光映射在无产阶级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隐秘叙事的方式强化资本的运行逻辑和增殖本质。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概念的核心意蕴,批判性地回应和解析了当前关于无产阶级“消失”“自由”“富裕”等错误思潮言论,进而论证了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时代“在场”。本文虽立足无产阶级概念的核心内核来回应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在场性的争论,但对无产阶级的劳动过程及剥削机制在数字语境中的抽象理论重构仍显不足。无产阶级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力量,孕育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对无产阶级在所处时代的研究,不仅要更从更深层次聚焦其本质与特征,还需深入探究数字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机制以及数字资本演绎拓展的本质逻辑,精准把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劳动方式和存在形态的最新动态。唯有如此,才能既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时代在场性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有力的话语阐释,又为数字时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Gorz A.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66.
- [2] 柯亨. 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 [M]. 霍政欣,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7.
- [3] 哈特,奈格里. 大同世界[M]. 王行坤,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28.

- [4] 迪尔-维斯福特. 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M]. 燕连福,赵莹,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6.
- [5] 阿甘本.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35.
- [6] Badiou A. *Éloge de la politique*[M]. Paris: Flammarion, 2017: 76-77.
- [7] Dean J. Critique or collectivity?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the subject of politics [M] // Chandler D, Fuchs C.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179.
- [8] 林锋,王先鹏.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概念及其现代发展[J]. *教学与研究*,2023(1):35-44.
- [9] 李素琴. 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嬗变:基于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的分析[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3):25-30.
- [10] 赵子晨,刘海军. 数字无产阶级:一个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描述性概念:基于马克思“典型分析法”的审视[J]. *社会主义研究*,2024(5):44-53.
- [11] 蓝江. 数字劳动、数字生产方式与流众无产阶级: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蠡探[J]. *理论与改革*,2022(2):60-72.
- [12] 程恩富,高斯扬. 智能经济及其相关论争的辨析[J]. *当代经济研究*,2024(8):44-51.
- [13] 巩永丹.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形塑:当代西方左翼主体理论的样式、困境及矫正[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4):182-191.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7.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7] 陈文旭. 资本主义数字化的阶段特征与趋向研判[J]. *国外理论动态*,2024(1):99-108.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M]. 杨立平,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1] 黄再胜. “数字繁荣”、数字劳动 2.0 与资本积累掠夺化:数字资本主义大模型生产初探[J]. *教学与研究*,2024(12):104-117.
- [22] 张九红. 数字劳动的主体性悖论及其超越:基于马克思劳动哲学视角的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2024(6):27-35.
- [23] 涂良川. 数字资本主义“隐秘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9(4):39-49.
- [24] 姜英华. 平台经济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3):71-82.
- [25] 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57.
- [26] 马尔卡希. 零工经济[M]. 陈桂芳,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 [27] Žižek S. *The Parallax View*[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6: 268.
- [2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 [29] 周建锋.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相对过剩困境:阐释与批判[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5):5-17.
- [30] 程萌. 人工智能会使无产阶级变成“无用阶级”吗?:技术图景中的马克思阶级政治学说[J]. *理论月刊*,2023(4):26-35.
- [31] 大卫·哈维.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 许瑞宋,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56.
- [32] 李钢. 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控制及其解放路径蠡探[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9):134-144.
- [3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4] 弗雷泽. 食人资本主义[M]. 蓝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5.
- [35] 大卫·哈维. 与大卫·哈维共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新解[M]. 张义修,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
- [36] Chancel L. 世界不平均报告 2022 年[EB/OL]. (2021-12-03) [2025-12-16]. https://wir2022.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1/12/Summary_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_Chinese.pdf.
- [37] 大卫·哈维. 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M]. 陈静,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247.

(责任编辑:陈丽琼)